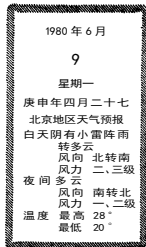


人民日报

RENMIN RIBAO



华国锋同志会见朝鲜人民军友好参观团

同朝鲜同志畅叙中朝两党、两国、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

新华社北京六月八日电 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今天下午会见了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人民武装力量部副部长白鹤林中将率领的朝鲜人民军友好参观团。

华国锋同朝鲜同志一起畅叙中朝两党、两国、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华国锋同志说，金日成同志提出的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三项原则和五点方针，是解决朝鲜问题的正确主张。朝鲜人

民都希望统一，朝鲜终究会统一起来。

白鹤林中将在谈话中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朝鲜人民为争取祖国统一所进行的努力和斗争。

我国国防部副部长肖克，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震等，参加了会见。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全明洙，大使馆武官官炳浩上校，也参加了会见。

量力而行是基本建设的重要方针

——再论量力而行的指导思想



本报发表社论《量力而行的指导思想十分重要》以后，在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中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在不久以前召开的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上，代表们联系基本建设工作实际，专门进行了学习、讨论。一致认为，量力而行应该是基本建设的重要方针。

量力而行，是党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在整个经济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也是坚持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的必然要求。基本建设是扩大再生产的重要手段，是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一个特殊的生产过程。同一般的工业生产相比，它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产品的固定性。一个建设项目，建在那里就不能移动，要长期发挥作用，搞不好就会长期包袱。二是周期比较长。一个大中型项目，在建设过程中要消耗大批资金、材料、设备和人工，一般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建成投入生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基本建设在“较长时间里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间内不提供任何有效的产品”。由于这些特点，基本建设就比一般的工业生产更加不能战线太长，规模过大，不能只靠需要，不考虑物力、财力等客观条件的可能。因此，量力而行这个指导思想，对于基本建设来说，更有直接的重要意义。

基本建设必须量力而行，这个经验是我们付出了高昂代价换来的。基本建设属于积累，积累不能过高，过高了，国民经济就要出毛病。三十年来，我国基本建设发生了两次大的起落，损失浪费惊人，都是由于积累率过高，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造成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量力而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比较谨慎，对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处

理得比较妥当，积累率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五，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相当快，人民生活也得到了相应的改善。一九五八年以后，经济建设中的“左”倾思想滋长起来，往往从政治需要出发，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用所谓“积极平衡”代替实事求是的综合平衡，用任意扩大基本建设规模的办法去“保”那个高指标、高速度。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积累率高达百分之四十，一九五九年竟达到百分之四十三。大部分基本建设投资于以钢铁为主的重工业方面，挤了农业和轻工业方面的投资，人民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结果，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严重失调，三年大跃进带来了三年大调整。高指标根本实现不了，“高速度”反而变成了低速度。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八年，积累率又提高到平均百分之三十三左右，其中一九七八年高达百分之三十六点六，基本建设规模也达到了历史最高峰。结果仍然是欲速不达，不得不再次进行调整，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三十年来，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中，有很大一部分投资没有经济效果。在已经形成的固定资产中，也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发挥作用。这个严酷的事实说明，那种只凭主观意志办事，不顾客观条件，只讲需要，不看可能，只图虚名，不考虑实际经济效果的做法，是极为有害的。如果再不改弦更张，量力而行，那末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就会越来越低。

那才是误国误民，遗患子孙后代。

过去，在如何确定基本建设规模和怎样有效地扩大再生产的问题上，有不少糊涂观念。比如，有些同志总以为基建投资越多，积累率越高，经济发展速度就越快。结果造成盲目争投资，争项目。新工厂年年建，投入再多的人力物力也在所不惜，却不顾建起来究竟效果怎样。有些

扩建工程没完没了，却不顾原料、能源能否供应得上，生产能力能否充分发挥。又比如，有些同志总是把基本建设和新建新厂等同起来，认为不建设新的工厂，就不能扩大再生产。结果是拆钱来建新厂，却不让许多老厂机器设备得到正常维修，更很少更新。

有些地方，某种生产能力已有富余，现有工厂已经闲在那里或开工不足，还千方百计地要投资建设新厂。他们不懂得充分利用现有企业，搞好挖潜、革新、改造，是增加生产极为有效的途径。这些同志大都出于好心，想把经济搞上去，想把速度搞得快一些，但由于违背了量力而行的原则，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

基本建设量力而行，关键在于老老实实地“量力”。要真正弄清楚我们的“力”究竟有多大。从这个实际出发，来安排建设的总规模和投资方向。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确一个基本观点，即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办事。我们搞基本建设，既不能采取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削弱简单再生产的办法，又不能容许财力、物力留有缺口。否则，就根本谈不上量力而行。所以，必须联系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解决好三个问题：

首先，要合理确定国民总收入中的积累率。前边已提到，我国多年来的经验证明，积累率在百分之二十五左右比较合适。当然，积累也不能全部用于基本建设，一般是用其百分之五十。这样，才能切实地把基本建设规模控制在国家（包括地方）实有财力允许的范围之内。

其次，要看基建材料、设备供应的可能。既要避免基建物资的大量积压，又不可搞“无米之炊”。有人以为，有了投资就不愁物资。其实，那还要看什么物资，并不是有了投资就要有什么有什么，特别在一定时间内更是如此，比如木材就一直是短缺的。因此，搞基本建设，不仅要量力，还必须量物力。这些年，许多工程建建停停，建设周期一再拖长，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停工待料，这是不量力，搞“无米之炊”所造成的。

（下转第三版）

彻底批判极左路线 尽快改变西藏面貌

拉萨召开建设新西藏动员大会

据新华社拉萨六月八日电 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动员大会，本月七日晚在拉萨召开。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阿沛·阿旺晋美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

大会由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代理第一书记田法唐主持。自治区党、政、军负责同志和干部、群众近两万人参加了大会。

阿沛·阿旺晋美说：西藏解放二十九年来，在党中央的关怀和西藏各级党委会的领导下，在各族干部、工人、农牧民、上层爱国人士和驻藏解放军战士们的共同努力下，西藏经过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彻底推翻了封建农奴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阶段，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

绩。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西藏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遭到了十年浩劫。打倒“四人帮”以后，由于我们对党的三中全会会议精神领会不深，贯彻不力，对极左路线没有进行彻底批判，极左路线的流毒还很深，使西藏的面貌改变不大。

他说：现在党中央已把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

新西藏的战斗任务摆在我们面前，自治区党委也制订和采取了若干重大政策和措施。我们西藏历史上一又一个新的进军就要开始了。我们要以高昂的战斗姿态，迎接这一新的伟大进军。

他说：我们要认真学习党中央的指示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继续解放思想，深入批判极左，端正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中

央指示和中央领导同志在西藏的讲话精神，是要我们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实现以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为主，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利；是要我们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大力发展经济，努力提高西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全区广大干部、群众、上层爱国人士和驻军指战员，都要立即行动起来，为实现这个目标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他还强调要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他说，我们藏族、汉民族要亲如骨肉，情同手足，永不分离。不管是什么人，都要破坏祖国的统一，破坏各民族的团结，都是违背西藏人民根本利益的，西藏人民是要坚决反对的。

阿沛·阿旺晋美最后说，在党中央的关怀下，最近我们西藏的形势飞速发展，我们坚信，有党中央的支持，有一百八十万人民的衷心拥护和辛勤劳动，我们建设新西藏的任务一定能够实现。

阿沛·阿旺晋美最后说，在党中央的关怀下，最近我们西藏的形势飞速发展，我们坚信，有党中央的支持，有一百八十万人民的衷心拥护和辛勤劳动，我们建设新西藏的任务一定能够实现。

阿沛·阿旺晋美最后说，在党中央的关怀下，最近我们西藏的形势飞速发展，我们坚信，有党中央的支持，有一百八十万人民的衷心拥护和辛勤劳动，我们建设新西藏的任务一定能够实现。

阿沛·阿旺晋美最后说，在党中央的关怀下，最近我们西藏的形势飞速发展，我们坚信，有党中央的支持，有一百八十万人民的衷心拥护和辛勤劳动，我们建设新西藏的任务一定能够实现。

阿沛·阿旺晋美最后说，在党中央的关怀下，最近我们西藏的形势飞速发展，我们坚信，有党中央的支持，有一百八十万人民的衷心拥护和辛勤劳动，我们建设新西藏的任务一定能够实现。

阿沛·阿旺晋美最后说，在党中央的关怀下，最近我们西藏的形势飞速发展，我们坚信，有党中央的支持，有一百八十万人民的衷心拥护和辛勤劳动，我们建设新西藏的任务一定能够实现。

阿沛·阿旺晋美最后说，在党中央的关怀下，最近我们西藏的形势飞速发展，我们坚信，有党中央的支持，有一百八十万人民的衷心拥护和辛勤劳动，我们建设新西藏的任务一定能够实现。

阿沛·阿旺晋美最后说，在党中央的关怀下，最近我们西藏的形势飞速发展，我们坚信，有党中央的支持，有一百八十万人民的衷心拥护和辛勤劳动，我们建设新西藏的任务一定能够实现。

阿沛·阿旺晋美最后说，在党中央的关怀下，最近我们西藏的形势飞速发展，我们坚信，有党中央的支持，有一百八十万人民的衷心拥护和辛勤劳动，我们建设新西藏的任务一定能够实现。

郭锋等同志亲自“挤”车调查

沈阳市群众“乘车难”问题基本解决

据新华社沈阳六月七日电 新华社记者王启星报道：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后，沈阳市群众“乘车难”的问题基本解决了。

去年底，市委第一书记郭锋收到一封群众来信，信中诉说了因经常挤不上车、上班迟到的苦恼。郭锋对这封来信提出的问题十分重视，他提出倡议：全市局以上领导干部除年老体弱者外，都要在乘车高峰时间，到最拥挤的线路上去同群众一起坐上车，找出解决群众乘车难的办法。

今年一月，正当数九寒天，郭锋和近五十名局以上领导干部分别来到十四条交通最拥挤的线路上。

他们和群众一样，在早晚上下班时往往要等半个到一个小时也上不去车。

郭锋和其他领导干部就这样坐了一个星期的公共汽车和电车。他们在乘车之余，多次召集乘客和司乘人员开座谈会，请大家一起来想办法解决乘车难的问题。

现在，全市公共汽车、电车上基本上做到了高峰不过二（即高峰时）车不超过两辆，平峰不留客。

为解决交通

公路交通路口长时间堵车现象大为减少；公安部门除加强交通指挥外，最近还成立了客运治安警察队，以便更好地维护交通秩序。

现在，市里已拨出一批专款，准备陆续解决交通车辆保养费和司乘人员住房、食堂等问题。

新华社郑州六月八日电 中共河南省西平县委和县革委会最近严肃处理了于敏卿、刘聚保倒卖山林、倒卖木材，从中牟取暴利二万元的严重事件，公安部门依法逮捕了于敏卿、刘聚保二名罪犯。

西平县酒店公社月林大队地处山区，境内有三万多亩山林。去年一月，这个公社车元大队的社员于敏卿找到月林大队党支部书记黄凤山，要求购买山林部分山林。黄凤山带领大队部分干部查看了牛心山、木山，非法决定把牛心山二百多亩山林作价一万五千元卖给于敏卿（按一百五十斤山菜，每斤价格一百元）。于敏卿和黄凤山谈妥后，就连忙到平顶山矿务局供销社坑木场联系。坑木场管理科主任不准擅自进入林区采伐和收购木材的规定，同意以三万五千元的价格收买牛心山砍伐的林木。在订立合同时，于敏卿怕事情败露，没敢用本公社的银行帐户，刘义福向于敏卿提供了舞阳工区尹集公社供销社的银行帐户，并用这个帐户签订了合同。于敏卿从平

西平县严肃处理破坏山林倒卖木材事件

于敏卿刘聚保受到法律制裁

于敏卿、刘聚保倒卖山林，破坏山林的事件发生后，县林业局、工商局、检察院和公安局联合组成调查组，对于敏卿等人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调查，决定追究于敏卿、刘聚保的刑事责任，责成黄凤山等有关人员作出深刻检查，视其态度再作处理。

沈阳鞍山市委分别召开会议 讨论中央书记处对建设北京四条建议

本报讯 据《辽宁日报》报道：中共中央书记处最近对北京市工作方针提出的四条建议，引起了沈阳市的高度重视。在短短的几天里，他们先后召开市委常委会和县团以上单位党员干部会议，认真传达贯彻，广泛开展讨论。他们认为，中央四条建议对搞好大城市的四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不仅为首都工作指明了方向，同样每一条都适用于沈阳市。

沈阳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及各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在讨论中指出，根据沈阳的具体情况，为贯彻落实中央书记处的四条建议，把沈阳建成适应四化建设的现代化城市，要全党动手，全民动员，努力做到：认真贯彻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把经济搞活，充分发挥沈阳工业的优势，经过挖、革、改，力争实现工业现代化；使科学、教育、文化走在前列；在社会治安、社会秩序和道德风尚方面成为辽宁的模范；沈阳也是有山有水有文物古迹的城市，也要下大力气改造环境，治理污染，使沈阳成为清洁卫生、绿化优美的城市；也要努力实现市场繁荣，使群众生活安定方便。

为了进一步把沈阳工作搞好，市委强调要把中央书记处的四条建议作为动力，推动当前工作。首先应按照四条建议的精神，检查和修订今年的工作计划，抓住重点，有所突破，取得成效。其次要注重在研究制定长远规划时，联系中央的四条建议结合讨论，并从沈阳市的特点和实际出发，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加快全市现代化建设步伐。

本报讯 据《辽宁日报》五月二十五日报道，鞍山市委认为，中央书记处关于北京市工作方针的四条建议，不仅适用于首都，也为鞍山市指明了方向和工作道路。市委连续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和部、委、办、局、工、青、妇以及三个城区等二十余个重点单位的领导干部会议，讨论了近期的奋斗目标 and 落实措施。

鞍山市委决心：解决好“骨头”和“肉”的关系，抓好住宅建设，有步骤地改造市中心的商业网点，发展一批居民区集体所有制的小市场零星网点和代销点，到一九八五年，商业网点的经营面积争取达到住宅面积百分之十五的标准。抓好科学研究工作，在积极培养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上下功夫，对现有的三万五千余名科技人员，努力做到专业对口，人尽其才，切实解决他们工作、学习、生活上存在的问题，在两年内把全市科技情报中心建立起来。千方百计地办好教育，切实解决环境污染，搞好城市绿化工作，把炼焦厂的熏烟、化工厂的黄烟、炼钢厂的红烟、选矿的红水、焦化的黑水治理好，到一九八五年使河水变清，空气清新。动员社会力量，打好教育、改造劣迹青少年的总体战；在职工中开展为四化立功活动，在青少年中开展学雷锋做好事活动，在妇女中开展做好妈妈活动，同时，大力整顿社会治安，依法严惩犯罪分子，经过三年的努力，使社会秩序有个根本的好转。

受欢迎的科技图书馆

本报讯 据《天津日报》报道：天津机械进出口公司开办的外国产品样

本资料阅览室，被国内许多有关科研单位、工厂、大专院校称赞为科技人员研究和学外国先进技术

的“科技图书馆”。这个“科技图书馆”积累了日本、西德等二十多个国家著名厂商的机械产品样本资料数十万册，涉及的门类包括航天、卫星、激光等数十个方面，有产品样本和产品更新换代情况介绍、产品制作图、还有一些机械丰富的理论论文。内容丰富，参考价值很大。

利用海蛎壳小杂鱼制饲料

本报讯 据《福建日报》报道：福鼎县前岐公社饲料厂利用海蛎壳、小杂鱼等作主要原料，生产钙饲料、鱼粉饲料和多种元素补充饲料，销售全国八个省的八十多个县，受到用户的欢迎。

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两年共生产钙饲料、鱼粉饲料、多种元素补充饲料三大类共十四种，计两千吨，产值三十二万元，盈利六万六千元。

本报讯 据《湖北日报》报道：在国民经济调整中，第二汽车制造厂立足国内，广辟货源，积极采用国产材料代替进口材料。今年以来生产每辆汽车消耗进口材料由去年的一千一百七十八公斤减少到五百二十公斤，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二。按今年产量计算，一年可为国家节省一千多万美元的外汇。

发展社会主义生产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但是，在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的改革中，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并不是生产的任何发展都能自然地使人民的需要得到更充分的满足。我们研究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除了

研究目的本身所包含的各种问题以外，还应该着力研究，在怎样的条件下，通过什么样的机制，社会主义生产才能越来越充分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过去有过一些什么原因使得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不能很好地实现满足人民需要的目的。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会有许多很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需要探讨。下面就从几个方面作为举例来谈一谈。

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不能很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同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密切的关系。要使人民的需要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得到越来越充分的满足，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是，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只有同生产力的状况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才能使社会主义生产得到迅速的发展，并在这个基础上使人民的需要得到更好的满足。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说，由于生产力还相当落后，各部门、各地区、各生产单位之间生产力的状况极不平衡，存在着差异极大的多层次的水平。在这种生产力的状况下，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使直接生产者在全社会范围内同生产资料结合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成为独一无二的、包罗一切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而应该建立和发展多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即除了全民所有制经济外，不仅在农村而且在城镇建立和发展各种形式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建立和发展各种公有制联合经营的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同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和优势的条件下，还应该保留一些个体所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只有这种同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才能促进各层次水平的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这一点，我们过去没有很好认识。我们曾不顾生产力的上述实际状况，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规模越大越好，公有化的水平越高越好，公有化的百分比越大越好，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比重越大越好。在这种错误认识的指导下，在所有制问题上，我们做过一些错误，例如，在城市的商业、饮食业方面使几乎全部集体所有制经济“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经济，绝大多数个体经济被砍掉。这样做的结果，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的几个问题

董辅初

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扩大了，但是生产的发展却受到了影响，人民的需要的满足遇到了困难。单就城镇中的商业网点来说，一下子就减少了差不多百分之八十，这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在我国农村中，不顾生产力状况，不顾人民需要的满足，追求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既大又公，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其后果更为大家所熟知。由此可见，为了使社会主义生产能够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的，我们应该从我国生产力的实际状况出发，从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需要的满足着眼，认真而又慎重地研究和解决好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问题，在所有制上的某些方面应该松动些、灵活些，不应强求一律。

从我国多年的实践来看，社会主义生产不能很好地实现自己的目的，还有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例如，在原有的经济体制下，企业在人财物产销方面没有自主权，凡事都得听从上级行政机构的命令和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企业想了为满足需要而生产也不可不得，更何况企业办考虑生产是否对路，是否能够满足用户的需要。上面没有让生产的产品就不生产，不必管对它有多么需要；上面叫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不必问它有没有用没有，反正产品由物资和商业部门统购包销。物资和商业部门也很难按照需要去组织货源。又如，在原有的经济体制下，市场不具有什么调节作用，企业的生产是按中央的指令性计划进行的。且不说集中的指令性计划根本不可能使千千万万个企业的千千万万种产品的生产符合于需要，而且原有的经济体制还束缚着企业的手脚，使其不能及时地变更计划以适应经常变化的需要。（这里所讲的需要包括着生产产品的需要，但是满足生产的产品，最终仍是为了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因此，在这种经济体制下，生产同需要的严重脱节是难以避免的。这种情况表明，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建立虽然使得满足人民的需要能够更好地实现生产的目的，但是，要使建立社会主义生产能够很好地实现这个目的，还必须建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合适的经济体制。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在新的经济体制下，使社会主义

经济能够有计划地、灵活地、富有效率和效果地运转，使生产和需要之间能建立紧密的联系，它们之间的不平衡能够及时地得到调节，从而使得社会主义生产能够通过各种经济机制的作用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的。目前正在试点的扩大企业自主权，在某些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市场进行调节，就是沿着这个方向改革经济体制所采取的步骤。

国民经济结构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也有很大关系。一国的经济结构是由许多复杂的因素决定的。对于同一个国家来说，不同的经济结构对于它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同的影响，会带来很不相同的结果。象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无疑应该逐步建立起经济上得以独立自主的经济结构。为此，必须有计划地逐步建立起强大的重工业。但是，我们发展重工业则是因为用先进的技术设备、更多更好的材料等等工业生产资料去装备我国的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从而使这些部门能够生产出更多高质量的产品，去满足社会及其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如果离开了这个目的，把发展重工业本身变成了目的，使其部门去为它服务，或者给它让路，就会形成重工业畸重、轻工业和农业畸轻、基本建设规模铺得很大的不良的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一经形成，就会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把我们的有限的物资、有限的资金和有限的技术力量不停地大量吸引到重工业和规模过大的基本建设中去，从而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不能很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很多，必须逐步地进行改变，以便使我们的国民经济得以迅速而协调地发展，并使人民的各种需要越来越充分地得到满足。

我们用一定的物力、财力和人力进行社会生产，能使人民的需要达到什么程度，还要看经济效果怎样。讲求经济效果，就是要用同样多的物力、财力和人力取得更大的有用效果，并在此基础上使人民的需要得到更充分的满足。多年来，我国生产的发展没有导致人民的生活得到相应的改善，同不讲求经济效果有一定的关系。由于不讲求经济效果，生产同样多的产

品，因为消耗大，就要拿出更多的产品去补偿这些消耗，从而可用于消费的就少了（如果不考虑积累率的变化）；在同样多的产品中，中间产品多了，可用于满足需要的最终产品也就少了；生产出的产品中，顶用的、适合需要的、质量好的产品少了，用这些产品所能满足的人民需要的程度，当然就低了。在实际经济工作中不讲求经济效果的事例是很多的。例如，有些工业企业不计消耗，不算效果，不问需要，只顾追求总产值；有些农业单位，为了追求牲畜的年末存栏数，不顾掉膘、减重、饲料和劳动力的浪费，把已经可供屠宰的牲畜继续饲养到年末，等等。这类生产除了只有统计数字上的表面价值以外，不能对人民需要的满足起多大的实际作用。相反，这类虚名的生产越多，人民的生活所受的实惠也越大。切实注重经济效果，这是使社会主义生产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的重要环节。

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出现背离自己的目的的情况，有时还同经济决策（特别是宏观经济决策）的失误有关。例如，关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决策，这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的大问题。但是，生产的高速度发展只有带来人民生活的迅速改善才有实际的意义，才能在消费的反作用下持续下去。如果生产发展很快，而人民的生活得不到相应的提高，高速度是难以维持的。遗憾的是，我们曾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生产发展的高速度作为经济建设的终极目的，试图追求脱离现实可能的、不顾人民生活改善的高速度。结果是欲速不达，生产和生活两受其害。为了追求这种高速度，在消费和积累的比值的选择这一重要宏观经济决策上也曾一再失误。过高的积累率给国民经济带来了全面的紧张，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经济决策上的失误使劳动人民已经创造出来的、本来可以用于改善人民生活和发展生产的大量成果付诸东流，特别是宏观经济决策上的失误往往是以亿元计的。因此，在作出决策时，特别是一些重大的宏观经济决策时，不仅应该反复进行经济比较，而且也要考虑到这种决策会对当前和长远的人民生活带来什么影响，是否有助于人民生活逐步改善。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涉及的范围很广，过去我们研究得不够，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生产赖以实现自己的目的的各种机制研究得很不够，它应该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再谈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关系

吴家麟

有同志讲：说无产阶级民主是从资产阶级民主发展而来的，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

他们的主要根据是列宁的这样一段话：“从这种必然是狭隘的、暗中排斥穷人的、因而也是完全虚伪和骗人的资本主义民主向前发展，决不会由派教授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所想象的，是简单地、直接地、平稳地走向‘日益彻底的民主’。不是的，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走别的道路”。（《列宁选集》第3卷第246页）其实，列宁的这段话，就已经把他们的论点推翻了。第一、列宁这段话谈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向什么方向发展的，这个问题，这个“无产阶级民主是不是从资产阶级民主发展来的”是不同的两个问题，不容混淆。第二、列宁明白白地说了，资产阶级民主“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引用这段话来支持“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从资产阶级民主发展来的”这一论点，岂不是适得其反了吗？

不仅如此，列宁还指出：“发展的辩证法（过程）是这样的：从专制制度到资产阶级民主；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从无产阶级民主到没有任何民主。”（《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第24页）这说明，民主是历史范畴，它本身就有产生、发展的过程。他们说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从资产阶级民主发展而来的，而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创立起来的。可是“创立”同“发展”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不就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创立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吗？

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毫无共同之处”吗？

关于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关系问题，我的基本看法是：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之间存在着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关系。一方面，二者之间是有本质区别的，无产阶级民主是最高类型的民主；另一方面，二者又是互相联系的，除了历史联系之外，二者都是专制制度的对立面，都要消灭民主。既然认为这些观点是错误的，可以批驳，但是起码不能把人家的原意任意歪曲。比如说，我是在肯定民主的阶级性并且指出两种民主有着根本区别的前提下讲二者还有某些共同之处的，

何曾主张过有一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同来的民主呢？又比如说，我只认为无产阶级也要讲自由、平等和人权，尽管我们和资产阶级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不同，但并没有把“自由、平等和人权”当作口号提出来，更没有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提出“自由、平等和人权”的口号是适宜的，怎么竟然变成自由、平等和人权这些资产阶级口号向党中央要什么民主呢？

他们还认为把“专制对立面”说成是无产阶级民主，那是“鱼目混珠”，因为据说资产阶级民主是专制的对立面，无产阶级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对立面。如果把无产阶级民主降低为专制的对立面，就等于把无产阶级民主篡改为了资产阶级民主。这个“就等于”真得奇怪。当然，反对专制并不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全部内容，甚至不是主要内容，因此不能把二者划等号，但是，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却是无产阶级民主的起码要求。试问：既然专制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对立面，那么，比资产阶级民主高千百倍的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专制的对立面吗？当然不能把共产主义降低到民主主义者的水平，但是，在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斗争中，共产主义者却必须站在民主主义一边，而绝不能站在专制主义一边。同样的，不能把无产阶级民主降低到资产阶级民主的水平，可是，谁如果反对专制，那他又怎么能充当无产阶级民主派呢？因此，把无产阶级民主说成是专制的对立面，绝不“等于”把无产阶级民主篡改为了资产阶级民主；而否认无产阶级民主是专制的对立面，倒有可能混淆无产阶级民主与专制的界限。

他们断言，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之间毫

无共同之处，如果说有相同之处，那就是文字符号相同。但此种相同如同用“国家”这个名词一样，世界上没有不同阶级的共同国家。看来，只要运用他们所强调的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就足以否定这种“毫无共同之处”的说法了。既然承认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那么，为何却要否认无产阶级民主、国家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之中有着民主、国家的共性呢？“民主”、“国家”明明是政治科学的范畴，有确定的内涵和外延，不管是哪一阶级的民主，都是一种与个人相对立的政治形式，不管是哪一阶级的国家，都具有阶级统治工具的共同属性，不能说是只“文字符号相同”呢？不仅如此，不同阶级的民主，不同阶级的国家，在形式方面还可以有某些相同之处哩！

要抛弃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切形式吗？

他们坚决反对无产阶级可以继承和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的某些形式，认为资产阶级形式我们不能学习，也没有必要学习，理由是：第一、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无产阶级民主内容同资产阶级民主形式是不能搞到一块的。第二、无产阶级必须打破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摆脱议会制，根本谈不上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的问题。第三、政治制度与科学技术不同，是有阶级性的，我们的政治制度比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优越千百万倍，根本不能没有没有必要学习和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形式。这些理由都是值得商榷的。

说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从内容，这当然是正确

资本主义社会的选举

张庆福

资产阶级的选举制度是在同封建专制制度长期斗争中逐步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虽然为资产阶级选举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但是在革命胜利后很长时期内，往往还要同封建残余势力进行激烈的斗争，才得以建立自己的选举制度。如在美国，一六八八年所谓的“光荣革命”就基本实现了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可是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国会还是由土地贵族控制着，工商资产阶级在国会中的权力还不小。一八三二年，国会被迫通过了选举改革法案，放宽了选举资格，扩大了资产阶级的选举范围。恩格斯曾经说过，这是“整个资产阶级对土地贵族的胜利。但是，这次改革并没有结束土地贵族在下院的统治地位，大多数选区的代表权仍然掌握在大地主手中”。一八六七年，在资产阶级激进派和广大人民都要求扩大选举范围的压力下，国会又通过了第二次选举改革法案，扩大了城市的选举权，初步改变了土地贵族控制下院的局面。以后又经过了多次改革，才使资产阶级选举制度完善起来。

在法国，这种斗争更为突出。在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后的很长时期内，法国政治风云变幻，一会儿实行共和，一会儿王朝复辟，还实行过帝制，直到一八七五年第三共和国建立，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包括选举制度）才基本稳定下来。

资产阶级的选举提出了普遍、平等、直接和秘密投票的选举原则，建立了竞选等一系列制度，打破了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废除了封建特权，使比以前更广泛得多的人有可能参

与，但同样正确的是：形式还有相对的独立性。拿民主形式来说吧，它不仅取决于民主的阶级本质，而且还受经济条件、历史传统、民族特点、阶级力量对比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同一民主内容可以采取不同的民主形式，不同的民主内容也可以采取相同的民主形式。

无产阶级打破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摆脱和废除议会制，并不意味着要抛弃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切形式。列宁说得很清楚：“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废除代议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议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构”，因为“如果没有代议机构，那我们就很难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列宁选集》第3卷第210、211页）

与科学技术不同，政治制度有阶级性，但由此并不能得出否定学习和利用某些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结论。他们既然把肯定学习和利用某些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的观点上纲到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高度，那么，我们就来听听革命导师是怎样教导的吧！“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地方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论十大关系》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同志在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中，还指出过：“中国应该学美国把责任和财富分散到五十个州的那种放权办法。中央政府不能什么事都干。中国必须依靠地方和地方的积极性。”（引自《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访华文集》）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不正是国家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吗？

人运动的高涨，绝大部分资产阶级国家逐步取消或放宽了选举资格的财产限制和其他一些限制，但决不是说财产和金钱不起作用了，只不过是表现形式不同了。现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选举保证金制度，就是候选人在登记竞选时，必须先交押一定数量的款额。选举揭晓后，如果没有取得法律规定数量的选票，保证金要被没收。如英国规定下议院各议员候选人交纳的保证金为一百五十英镑，如果他得到的选票不足选区全部选票的八分之一，其保证金由国家没收。法国规定一个议员候选人交纳一万法郎（总统候选人为一万法郎），如果在第一轮选举中得不到选票总数的百分之五，保证金被没收。日本选举议员也有类似的规定。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竞选开支十分惊人。据统计，美国一九七八年的中期选举就花了二亿五千万美元。参议员赫尔姆斯人的竞选费用高达六百五十万美元，等于几百个普通工家庭一年收入的总和。一九七八年法国立法选举，平均每个候选人的竞选费用将近十三万二千法郎。英国一九七九年大选至用上七十五万英镑。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要参加竞选活动，除了保证金和竞选费用外，还有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等各种限制。所有这些条件放在一起，不仅剥夺了广大普通劳动者的竞选权利，也限制了缺乏经济条件的进步党派参加竞选，从而实际上为垄断资产阶级政党控制选举大开方便之门，而使一般工人失去参加管理国家的机会。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每次选举结果，几乎都是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当选。

（摘自《百科知识》一九八〇年第五期《选举制度的变迁》一文）

《太平经》是我国早期道教的一部经典，成书于汉代成帝时代，全书共一百七十卷。原书早已亡佚，现在所存的，只有明朝修撰的《道藏》里收进的《太平经》五十七卷。此外，还有一部抄本即唐人闾丘方远的《太平经钞》十卷。现在重印出版的《太平经合校》是王明将上述的两个本子及其它二十种书引文加以汇编和互校，大体上恢复了原书一百七十卷的面貌，从而为研究中国哲学史和道教史以及东汉中期以后的社会情况，提供了一部很有价值的资料。

《太平经》是一部道教经典，宣扬的是有神论和封建思想。但据学者研究，书中也有我国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法思想。有一些篇章还反映了这样的思想：反对统治阶级不劳而食和聚敛财富，主张自食其力和勤劳周急；反对恃强凌弱，主张扶老养老；反对知识多的人欺侮知识少的人，主张有知识、道德的人应该相敬等。虽然这些进步思想、观点多是以阐释道教教义出现的，但也不免自相矛盾，但还是反映了一些当时受压迫、受剥削人民的痛苦和愿望的。汉末兴起的黄巾起义，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受了《太平经》中某些进步思想的影响而掀起的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运动。王明编著的《太平经合校》一书，中华书局曾于一九六〇年出版，但当时印数很少，又经过十年动乱，现今已流传无几。根据学术界的要求，又经编者修订，此书已重印出版发行。（中牟）

报刊
论文
摘要

